

裕固族东迁以前藏传佛教传播情况考略

贾学锋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利用汉藏文资料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资料, 对明朝中叶裕固族东迁之前各历史时期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 并对裕固族东迁的宗教原因进行了探讨, 认为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东迁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裕固族; 东迁; 藏传佛教; 传播

中图分类号: K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20 (2010) 03 — 0059 — 05

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长期传播与发展对裕固族历史及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但目前学术界对裕固族的研究多以语言、历史、民俗等为重点, 宗教的研究还略显薄弱, 现有的相关论著中, 对于裕固族在历史上从何时信仰藏传佛教这一重要问题探讨不多, 认识尚不明确。本文拟利用藏汉文资料及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回鹘文佛教文献资料, 对裕固族东迁前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考证。

一、裕固族先民早期佛教信仰的历史考察

现在生活于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黄泥堡裕固族乡的裕固族的先民回鹘人早期主要信仰萨满教, 但佛教在漠北回纥汗国时期已传入回鹘中, 史书记载唐代回鹘“有特健俟斤死, 有子曰菩萨, 部落以为贤而立之”。^[1]这说明到公元7世纪中叶, 佛教已对回鹘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末至宋时的甘州回鹘被认为是裕固族的直系祖先, 当时其所处河西地区, 佛教文化高度发达, 回鹘长期生活于此, 在思想文化、习俗诸方面逐渐受到佛教的影响和熏陶: 回鹘“奉释氏为最, 共为一堂, 塑佛像其中。每斋必封羊, 或酒酣以指染血涂佛口, 或捧其足而鸣之, 谓为亲敬。颂经, 则衣袈裟, 作西竺语”。^[2]在甘州回鹘政权中僧人有一定地位, 其可汗常派僧人出使宋朝, 如1007年甘州回鹘可汗药落纥遣尼法仙等向朝廷献马十匹, 不久又遣僧翟大秦贡马十五匹。此次朝贡的僧人还游历了

五台山等佛教名胜。^[3]两年后, 甘州回鹘又遣僧翟大秦入贡, 并请求在京城建佛寺。公元1028年甘州回鹘被西夏打败, 部众四散, 其中一部逃至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等地, 历史上将其称之为沙洲回鹘。沙州回鹘所在之敦煌一带, 佛教历史悠久, 香火旺盛, 进一步促进了佛教在回鹘中的发展, 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中都保存有大量的回鹘壁画、供养人像等。凡此种种都说明, 唐代以来由于佛教的长期弘传与流布, 至宋时佛教已在河西回鹘中兴盛起来。

公元1036年西夏攻占瓜、沙等地后, 部分回鹘部众役属于西夏, 留居西夏的回鹘僧人, 佛学造诣高深, 为西夏所重用, 回鹘佛教由此成为西夏早期佛教的重要来源之一。史载回鹘僧人在西夏表现活跃, 有的还曾担任西夏国师, 享有崇高的地位, 其中有景宗元昊时主持译经的国师白法信, 惠宗秉常时主持译经的安全国师白智光。^[4]此外, 回鹘僧人在西夏佛教经典翻译中亦做出了重要贡献, 曾将汉文《大藏经》译为西夏文。公元1047年, 李元昊在其首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 建高台寺, 请回鹘僧人将宋朝赠送的《大藏经》翻译为西夏文。^[5]1055年西夏皇后没藏氏赴高台寺, 广延回鹘僧登座演讲。1067年西夏“献金佛、《梵觉经》于辽, 经系回鹘僧所演, 历二十年乃成”。^[6]1095年, 西夏“进贝多叶经于辽。经, 回鹘僧所译”。^[7]以上史实充分说明, 当时回鹘之佛教已很发达, 出现了很多高僧大德和翻译人才。

裕固族先民在宋代被称为“黄头回纥”, 他们大

收稿日期: 2009-11-09

作者简介: 贾学锋(1975—), 男, 藏族, 甘肃肃南人, 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宗教学专业博士。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 藏传佛教。

体上活动于今甘、青、新三省交界地带。虽然史料中对黄头回鹘的记载较少，但可以肯定，作为回鹘分支的黄头回鹘同样是信仰佛教的。1068年黄头回鹘还向宋朝入贡，求买金字大藏经，宋朝赐其墨字大般若经一部。^[8]至于当时黄头回鹘是否信仰藏传佛教，学术界尚无定论。笔者认为，宋代黄头回鹘已与藏传佛教产生密切联系，极有可能受到了藏传佛教影响，理由如下：第一，至宋代，佛教在回鹘中传播已历时二百年，佛教的教义、思想、仪轨等为回鹘所吸纳、接受，为其接受藏传佛教提供了有利条件。第二，早在唐代其先民甘州回鹘就和吐蕃有着广泛的政治、文化交流，双方在宗教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如吐蕃时期回鹘人的神白哈尔被迎请到了吐蕃，作为桑耶寺的守护神，而回鹘佛教亦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带有浓厚的密教色彩。^[9]第三，宋代的黄头回鹘与藏族处于毗邻状态，当时正值藏传佛教以青海等地为基地向外传播之际，黄头回鹘之地难免受其影响。此外，黄头回鹘又与西夏控制的瓜、沙等地相连，西夏王室笃信藏传佛教，其藏传佛教“主要传播在藏族居住地区并向靠近藏族居住区的整个河西走廊发展，敦煌、甘州（今甘肃张掖）、凉州（今甘肃武威）都有藏传佛教的重要影响”。^[10]可见，宋代的黄头回鹘因所处地理位置之缘故而受到了藏传佛教的辐射、影响，极有可能是当时回鹘各部中较早接受藏传佛教的，后世发现的大量回鹘文藏传佛教经典应与其有密切的关系。

二、元代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

元朝皇帝忽必烈和许多王公贵族尊奉藏传佛教，促使藏传佛教迅速向其他民族和地区传播，而萨班、八思巴、噶玛拔希等许多高僧大德都曾在内地传教讲经，广施法雨，则直接促使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迅速发展。

元代藏传佛教各派中萨迦派在畏兀儿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萨班在凉州传教时，由畏兀儿人担任其翻译，在致蕃人书中说：“汗王对我关切逾于他人，故汉地、吐蕃、畏兀儿、西夏等地之善知识大德及官民百姓均感奇异，前来听经，极为崇敬。”^[11]萨班曾亲临肃州（今甘肃酒泉）文殊山一带传法，此后藏传佛教在该地经久不衰。^[12]在已经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中有萨迦班智达著作的译本，《无量寿佛经》即为其中之一，并指出完成此著作的地点是在凉州。^[13]八思巴为畏兀儿等民族培养了大批僧人，

《汉藏史集》中载：“八思巴总计为尼泊尔、印度、汉地、蒙古、高丽、大理、畏吾尔、和申等地的比丘和比丘尼、沙弥和沙弥尼四千人授戒剃度，为四百二十五人担任过受戒的堪布。”^[14]在已发现的回鹘文佛经中也有八思巴的回鹘弟子本雅失里由藏文翻

译的密宗文献《转轮王曼陀罗》。^[15]

元代畏兀儿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也从充分体现了在藏文佛教经典的翻译方面。元代畏兀儿中涌现了许多高僧大德，他们将大量藏文佛经翻译为回鹘文，促进了藏传佛教在畏兀儿中的传播。如纳蓝必识里、阿鲁浑萨理、纳迦鲁达思、舍蓝蓝等。纳蓝必识里，高昌人，“其所译经，汉字则有《楞严经》，西天字则有《大乘庄严宝度经》、《乾陀般若经》、《大涅槃经》、《称赞大乘功德经》，西番字（即藏文，引者注）则有《不思议禅观经》，通若干卷。”^[16]阿鲁浑萨理，来自北庭，曾师从八思巴学佛法，以广博的知识和语言天赋，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官至尚书右丞、中书平章政事。由于蒙古统治阶层不谙藏语文，元朝皇帝令回鹘人研习藏语文，如纳迦鲁达思“命于国师讲法，国师西番人，言语不相同。帝因命纳迦鲁达思从国师习其法，及言与文字，期年皆通”。^[17]回鹘女僧人舍蓝蓝曾专门在元朝皇家中为后妃讲经说法，并“以黄金缮写番字藏经，般若八千颂、五护陀罗尼十余部，及汉字华严、楞严，畏兀字法华、金光明等经二部”。^[18]此外，近代从吐鲁番、敦煌藏经洞中出土了大量的回鹘文佛经，对这些佛经的研究证明，“从藏语翻译过来的文献有16种，其中，密宗文献14种，大乘文献1种，论部1种。”^[19]

藏传佛教噶举派也在元代传入了畏兀儿中。藏文史籍《贤者喜宴》中记载，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在回藏地途中，“将汉地、蒙古、西夏及维吾尔等所有一切众生招集起来，躬身佛法”。^[20]元代藏传佛教在畏兀儿聚居地河西及新疆哈密、高昌等都有广泛传播，出自敦煌莫高窟的元代洞窟中的回鹘文佛经中有“我哈密人，以畏兀字译西番经”等语。西番经当为藏文佛经，这表明元代哈密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畏兀儿人数不少。同时，藏传佛教也传入了高昌地区，并对其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高昌王国也曾采用藏文字母拼写回鹘语言，抄写文书。”^[21]高昌出土的大量回鹘文藏传佛教经典，证明了当时藏传佛教在该地的兴盛状况。

元代史书中将裕固族先民称为“撒里畏吾”，此即宋史中“黄头回鹘”的音译。1226年蒙古大将速不台受命攻下撒里畏吾之地，从此至元末的一百多年中，撒里畏吾地方长期受到安西王忙哥剌、西平王奥鲁赤、镇西武靖王铁木而不花及察合台系宗王出伯等蒙古诸王的统治。蒙古王室成员和上层贵族大多笃信藏传佛教，如威武西宁王速来蛮就信仰佛教，他是敦煌的功德主，在敦煌莫高窟中有其题记。^[22]由于长期的政治统治与经济文化交流，蒙古族信仰的藏传佛教对撒里畏吾产生了直接影响。

三、明代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发展

撒里畏兀儿在明代中后期部众离散,几经迁徙,失去了本民族的文字,汉文史籍中对其宗教方面的记载语焉不详,但通过对相关史料的爬梳和分析,还是能够理出明代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的蛛丝马迹:

1. 明代关西七卫中蒙古、回鹘、藏等民族处于杂居状态,在文化方面相互多有影响,撒里畏兀儿人已接受和使用藏族的名字。笔者在《明史》的相关记载中发现一些具有藏族特征的人名频繁出现在撒里畏兀儿各卫和罕东卫中。如1424年安定卫指挥的孙子名曰“散哥”,这也是常见的藏族人名。明代关西各卫中出现的藏族人名还有很多,如罕东卫指挥“绰里加”,显然系藏族常用人名(khro-rgyal)之汉语音译。再如,罕东部人俺章之子“班麻思结”,应是藏族人名(pad-ma-sangs-rgyas),罕东卫密罗族人“格刺思巴监藏”,应为(dge-legs-srid-pa-rgyal-mtshan),安定王“桑儿加矢夹”对应的藏文是(sangs-rgyas-tshangs-dbyangs),赤斤蒙古人“且旺矢加”,应为(chos-dbang-shvakyas),罕东卫正千户之子“公藏思加”,对应的藏文是(mgon-tsang-skyabs)。又如,1498年的安定王陕巴,对应的藏文是(byams-pa)。类似人名在明代关于关西诸卫的记载中还有很多,此不例举。这说明由于藏传佛教在裕固族先民中不断发展,到了明代已影响了撒里畏兀儿人的文化与生活诸方面。

2. 明廷曾派藏传佛教高僧对撒里畏兀儿进行诏谕或安抚。《明史》载,1392年“西宁番僧三喇为书诏降罕东诸部,又建佛刹于碾白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救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坛寺。”^[23]三喇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高僧,在甘青藏区长期修行传法有一定的影响。明代罕东卫等诸卫的部众东迁以后多融合于撒里畏兀儿之中,成为今天裕固族的先民。明朝派藏传佛教高僧招抚撒里畏兀儿之事不独此一例。1426年,明廷又以协讨安定、曲先之功,封思巴领占等五人为大国师,封刺麻著星等六人为禅师。安定、曲先、阿端卫被称为撒里畏兀儿三卫,是明朝为管理撒里畏兀儿地区之事务而设立的,明廷派藏传佛教高僧对以上各卫民众进行招抚与安慰,这说明当时藏传佛教在撒里畏兀儿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撒里畏兀儿的一些统治阶层也信仰藏传佛教。如明初安定王卜烟帖木儿就是一位佛教徒,在敦煌榆林窟中有其题记。^[24]安定王亦班丹也是一位藏传佛教信徒,他册封国师,抬高僧人的地位并派遣僧人出使明朝。史载,“安定王亦班丹遣国师舍刺藏卜来朝,贡马,赐彩币表里。仍名舍刺藏卜赉彩币表里赐其王。”^[25]

3. 藏文史籍和裕固族民间流传的史诗也反映了明代裕固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如《安多政教史》中载,第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到甘州(今甘肃张掖)时,明廷令甘州提督派大军到马蹄寺迎候,他在马蹄寺给当地官员们“授与了三要义妙法,在街市上,由翻译用汉语、裕固语、蒙古语口译了观世音菩萨的修行法,释放了都堂属下牢内的囚徒,新剃度出家为僧者约有一百人。”^[26]

明代藏传佛教在撒里畏兀儿中的传播情况,在裕固族的一些口碑资料中也有所反映。裕固族著名史诗《来自西至哈至》中唱道:东迁前“大寺院常年香火缭绕,大活佛每日里闭目合掌。部落里到处是经幡,奴隶们却为自己的双手歌唱”;“许多年前那里灾害降临,狂风卷走牲畜,沙山吞没帐房……寻不见寺院,找不到黄金筑起的经堂。”^[27]史诗中所描述的情况极符合藏传佛教的特征,说明东迁前裕固族已经有属于自己的寺院和僧人。

4. 明代中后期至清初,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瓦喇部、土默特部和准噶尔部先后对撒里畏兀儿地区的长期统治促进了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的传播。

元朝灭亡后,蒙古瓦剌部迅速崛起,至明朝永乐年间,脱欢统一西蒙古,脱欢是藏传佛教信徒。《明实录》中记载,瓦剌曾派僧人出使明朝,明朝“命瓦剌顺宁王脱欢使臣哈马刺·失力,为兹善弘化国师,大藏为僧录司右觉义,答兰·帖木儿等指挥镇抚等官。”^[28]而脱欢之子也先即位后,极力向外扩张,控制了哈密、罕东、赤金蒙古等卫,撒里畏兀儿也受其统治。1446年也先曾与罕东卫都指挥通婚:“河州卫番僧加失领真在罕东卫住坐年久,为其都指挥班麻思结奉使往瓦剌也先处约为婚姻,交往甚密。”^[29]也先非常推崇藏传佛教,“仿照元代蒙古尊立国师的做法,也先立三答失里为其国师。”^[30]也先曾向明朝“又别为其国师三答失里,番僧撒灰帖木儿等奏求僧帽,僧衣,佛像,帐房,金印,银瓶,供器等项,俱不允。”^[31]

明代中后期蒙古俺达汗入居青海,撒里畏兀儿地方亦被其征服:“阿勒坦汗行兵萨哈连图伯特地方,将上下沙喇卫郭尔(即撒里畏兀儿,引者注)二部落,尽行收服。”^[32]从此以后,撒里畏兀儿受到蒙古土默特部的统治。清初蒙古准噶尔部兴起,撒里畏兀儿又归其统治,并向噶尔丹交纳赋税:“康熙年间,黄番(指裕固族,引者注)黑番(指河西走廊中部一带的藏族,引者注)俱纳噶尔丹添巴,岁遣数骑驱牛羊往金山。”^[33]俺达汗、噶尔丹都与藏传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俺达汗将藏传佛教格鲁派全面引入了蒙古族中,噶尔丹曾在拉萨三大寺中学法,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弟子,也是尹咱胡图克图活

佛的传世。因此明末清初的撒里畏兀儿在宗教文化方面受到了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族的强烈影响。在当时的穆斯林史料中对这种关系也有记载：“但在17世纪时，我们又发现伊斯兰教在东突厥斯坦衰败了，绰罗斯的阿卜德·克里姆（1560—1591）、穆罕默德（1591—1609）和艾哈迈德（1609—1618年）诸汗就已显得被大大削弱了，他们的汗国在喇嘛教的推进下衰退了，当时真正的蒙古人，即斡亦刺人（卡尔梅克人）取得了喇嘛教的控制权，黄头畏吾儿（萨里畏兀儿）人进一步向斡亦刺人和西藏人靠拢了，形成了旨在反对伊斯兰教的一种新佛教。这些畏吾儿人变成了互有联系的‘喇嘛’，而斡亦刺人的可汗巴图尔·珲台吉（1634—1653）建立了一个‘宗教汗国’，包括蒙古地区（卡尔梅克斯坦）、畏吾儿地区（畏吾儿斯坦）和西藏的东部。”^[34]

四、余论

第一，学界在分析裕固族东迁之因时，往往认为明朝中后期吐鲁番政权不断侵袭撒里畏兀儿各卫，加之关西各卫之间互相攻伐导致安定、罕东、曲先、阿端等卫相继残破，使撒里畏兀儿被迫东迁。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裕固族东迁的政治、军事原因，却忽视了宗教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撒里畏兀儿东迁与其宗教信仰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裕固族先民回鹘在唐宋时期已信仰了佛教，元代时藏传佛教在畏兀儿各部中广泛传播，长期受佛教的浸染和熏陶，使撒里畏兀儿在宗教信仰、民族认同、风俗习惯等方面与信仰伊斯兰教的畏兀儿之间有了明显差异。因此，当新疆伊斯兰教日渐东传时，这种差异便显现出来，成为关西各卫残破时裕固族向信仰佛教的河西走廊东迁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可以这样认为，东迁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信仰藏传佛教的撒里畏兀儿与已伊斯兰化的维吾尔人之间宗教信仰差异的体现。

撒里畏兀儿东迁后其部众被明廷安置在河西走廊祁连山腹地，与青海、河西等地藏族杂居，政治上受到中央政府的庇护，生活趋于安定，社会生产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藏传佛教在裕固族中进一步发展，至明末在今青海省祁连县境内建立了裕固族历史上有明确记载的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黄藏寺。它的建立在裕固族宗教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表明撒里畏兀儿东迁祁连山区，加速了信仰藏传佛教的进程，是撒里畏兀儿各大部落信仰藏传佛教的标志。”^[35]

第二，裕固族的民族形成过程中宗教的作用和影响不容忽视，这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族与宗教的复杂关系。裕固族是以历史上的回鹘、蒙古为主，融合汉、藏等民族而形成的，其形成过程，不仅是民族分化、组合的产物，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相

互影响、交融、渗透的过程。现代裕固族中操东部裕固语的皇城、康乐等地的裕固族中融合了元、明时代的部分蒙古人。这一民族融合、文化交融的过程，始自元代。有明一代，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得到了普遍发展，成为蒙古人的主要信仰。明代以来是裕固族形成的重要时期，民族融合现象更加明显，更多蒙古人融入了撒里畏兀儿之中，如罕东部的蒙古人经历了近二百年的时间，融合于曲先卫撒里畏兀儿。^[36]这不仅给裕固族这一民族共同体注入了新的血液，而且加快了其信仰藏传佛教的进程。长期以来，藏传佛教对东部裕固语地区的影响甚至超过了西部裕固语地区，两者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如，由于深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加之与藏族杂居，东部裕固语地区有的部落甚至以藏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如现分布于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皇城镇的鄂金尼部落（即曼台部落），迄今为止，这个部落的部分人家在家庭生活中使用藏语。^[37]根据2009年8月笔者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大河乡、明花乡等地的考察发现，直至现在这种差异还在裕固族地区有所体现，东部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氛围较之西部更加浓厚，每家家中几乎都有佛龛供佛像，院落中插有玛尼旗。裕固族东西部地区在藏传佛教信仰方面存在的这种差异，既有现实的原因，同时与裕固这一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受藏传佛教影响的程度等情况不无关系。

注释：

①东迁入关，是裕固族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影响的一件大事。但关于东迁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大多数学者主张从明代中叶开始，一直持续到嘉靖年间。参见《裕固族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本文亦取此说。

②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黄头回纥是回鹘之一支，但对于其源自于历史上哪支回鹘，则有各种不同观点，有甘州回鹘、龟兹回鹘、西州回鹘之说。黄头回纥的来源复杂，很难断定具体源于哪一支回鹘人。裕固族学者钟进文教授指出，黄头回纥也许与甘州回鹘、龟兹回鹘、西州回鹘均有渊源关系。参见《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民族出版社，2002年，第8页。

③2008年7月笔者在裕固族地区进行调研时，裕固族学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县志办主任、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主任铁穆尔先生告诉笔者：虽然当时白哈尔神被请到了吐蕃，但在裕固族民间却一直保持着祭祀白哈尔神的传统，直至1958年。相传过去裕固人去拉萨乃琼寺磕头，白哈尔神会因感动而降下。史书所称的白哈尔神所居之“巴达霍尔”，即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马蹄乡芭蕉湾、楼庄子一带。又，《安多政教史》载：“在裕固地

方,至今还有一处称为巴达如哇的父族部落和几处禅院废墟,认为这就是当年被摄招为桑耶寺护法的圣地巴达霍尔的禅院。”见智观巴·贡却呼丹巴绕吉著,吴均等译,《安多政教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第144页。类似记载,亦见于松巴堪布·益西班觉著,蒲文成、才让译,《如意宝树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545-546页。

④目前,学界对黄头回鹘与元初的“撒里畏吾”之间的嬗变关系,基本得到了公认。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黄头回鹘是裕固族的族源。如汤开建《解开“黄头回鹘”及“草头鞑靼”之谜》、董文义《黄头回鹘释论》、高自厚《再谈“黄头回鹘”的由来和含义》等文都主张此说。

参考文献:

- [1] 旧唐书. 回纥传(卷195) [M].
- [2] (宋)洪皓,翟立伟标注. 松漠纪闻 [M].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6: 15.
- [3][8] 宋史. (卷490) [M].
- [4] 史金波. 西夏佛教史略 [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141.
- [5][6][7] (清)吴广成撰,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 [M]. (卷18, 21, 29)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 [9] 杨富学. 回鹘之佛教 [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55.
- [10] 史金波. 西夏佛教新证四种 [J]. 世界宗教研究, 1989(1).
- [11] 阿旺·贡噶索南. 萨迦世系史 [M]. 陈庆英, 高禾福, 周润年, 译注.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9: 94.
- [12][26] 智观巴·贡却呼丹巴绕吉. 安多政教史 [M]. 吴均, 毛继祖, 马世林译.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1989: 145, 143.
- [13][15] 杨建新, 王红梅. 元代回鹘藏传佛教文献研究概况 [J]. 兰州大学学报, 2001 (1).
- [14]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 汉藏史集 [M]. 陈庆英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181.
- [16] 元史 [M]. 卷202.
- [17] 张羽新. 元代的维吾尔族喇嘛僧 [J]. 中国藏学, 1996 (2).
- [18] 佛祖历代通载(卷22) [M].
- [19] 牛汝极. 敦煌吐鲁番佛教文献与回鹘语大藏经 [J]. 西域研究, 2002 (2).
- [20] 黄颢. 贤者喜宴译注四 [J]. 西藏民院学报, 1987 (2).
- [21] 余太山. 西域通史 [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301.
- [22] 公维章. 元明清时期的敦煌佛教 [J]. 敦煌学辑刊, 1999 (2).
- [23] 明史(卷330) [M]. 西域传.
- [24] 牛汝极. 敦煌榆林窟千佛洞第12窟回鹘文题记 [J]. 新疆大学学报, 2002 (1).
- [25] 明英宗实录(卷112) [M].
- [27] 才让丹珍. 裕固族风俗志 [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3: 41; 裕固族简史编写组. 裕固族简史 [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45.
- [28][29][31] 明英宗实录 [M]. 卷37、144、223.
- [30]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蒙古族通史编写组. 蒙古族通史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1: 49.
- [32] 甘宁青史略(正编卷15) [M].
- [33] 甘州府志(卷16) [M].
- [34][法]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 [M]. 耿升译. 北京: 中华书局, 1993: 382.
- [35] 钟进文. 裕固族文化研究 [M]. 北京: 中国民航出版社, 1995: 159.
- [36] 钱伯泉, 吐娜. 罕东左卫蒙古人的迁徙及其融入撒里畏兀儿的经过 [A]// 钟进文. 中国裕固族研究集成 [C].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105.
- [37] 铁穆尔. 16-20世纪的尧熬尔(裕固族)氏族和部落 [J]. 哈萨克斯坦凯纳尔大学学报.

On the Dif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among Yugur before Its East-oriented Migration

Jia Xue-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aterials written in Tibetan and Chinese languages and the Buddhism documents in Uigur language that unearthed from Dunhuang and Tulufan, the writer tries to systematically research the diffu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Buddhism among Yugur in each period before their East-oriented migration. The paper argues that it was before their east-oriented migration in the middle time of Ming Dynasty that Yugur had believed in Tibetan Buddh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actually had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during the process.

Key words: Yugur ethnic group; East-oriented migration; Tibetan Buddhism; Diffusion

[责任编辑: 朱耀善]